

丛书总主编◎季羨林

主编◎牧惠 蓝翎 朱铁志

杂文卷

真话

的

空间

1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

季羨林题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杂文卷
丛书总主编 季羡林

真话的空间

主编 牧惠 蓝翎 朱铁志

(-)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话的空间:杂文卷/牧惠,蓝翎,朱铁志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5(2002.1重印)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季羨林总主编)

ISBN 7-80094-516-2

I. 真…

II. ①牧…②蓝…③朱…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949 号

真话的空间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3 字数 857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516-2/I·322

定 价:210.00 元(全七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

季羡林题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顾问名单

钟敬文	张岱年	卞之琳	林 庚	陈 原
任继愈	冯亦代	严文井	周汝昌	范 用
黄苗子	郁 风	丁 聪	吴祖光	郭预衡

总主编：季羨林

编委会名单

季羨林	牛 汉	林斤澜	姜德明	邵燕祥
汤一介	乐黛云	宗 璞	牧 惠	高 莽
李国文	谢 冕	王德后	王富仁	钱理群
刘梦溪	柳 萌	母国政	舒 乙	朱 正
张思之	张抗抗	李景峰	斯 妤	邓九平

执行主编：牛 汉 邓九平

本卷策划人：张家勋

序 言

牧惠 蓝翎 朱铁志

199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盛典到来之际，我们作为杂文作者和编者，也在以特有的方式，思考着拿什么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当过多的鲜花和赞誉接踵而至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自己熟悉的杂文，想到了建国五十年来思想文化的风风雨雨，想到了无数前辈走过的曲折而艰难的道路，想到了哪些浸透血污和泪水的思想结晶。

以梳理杂文的方式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前辈思想者的尊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后人的交代，这是我们选编本书的根本动因。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五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却是饱含风霜雨雪

的漫长历程。在这个一言难尽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新生的喜悦、再生的欢愉，也有毁灭的痛苦、失落的惆怅。一部新中国杂文的历史，就是杂文家同国家民族同甘共苦的历史，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自由品格张扬与压抑的历史，就是新中国思想解放历程曲折演进的真正写照。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能够看到知识分子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满腔赤诚，也能看到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习惯势力、旧有传统对新思想、新观念、新见解的压抑和封杀。杂文这朵坚强而脆弱的小花，在风雨中飘摇，在崖缝中挣扎，显示出威武不屈的雄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杂文的历史命运，正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真正缩影。

新中国虽然走过五十年风雨历程，但杂文的发展并未同步行进。个中缘由不在杂文的自我封闭，而在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天，当代杂文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形成了三个规模不等的高潮：一是1956—1957年初夏反“右派”之前，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后，延续不到一年时间；二是1961—1962年，即为了

挽救“大跃进”所造成的危急局面，在国民经济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在文艺方面提出“文艺十条”、“文艺八条”之后一年多的时间；三是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至今的二十年间。“三个高潮”断断续续半个世纪，然而累积起来不过二十多年而已。从总体上说，“文革”前的十七年，是杂文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时期；“文革”十年，是包括杂文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全面荒芜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的二十年，是杂文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建国后杂文发展最为迅速、成就最为壮观的时期。然而就是这二十年杂文的发展，也并非一马平川、毫无羁绊。杂文的兴衰，总是随着思想解放的力度和舆论空间的大小而起伏的。

—

以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化会为标志，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文学史家所说的“当代文学”时期。建国后的两三年，国家虽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但新的人民文艺却

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局面，各种文学样式不断涌现佳作，文学新人也不断出现。然而，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杂文，却显得相对沉寂。尽管有夏衍的百余篇专栏文章、有“马铁丁”（陈笑雨、张铁夫、郭小川）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思想杂谈”、有1953年《人民日报》集中发表的一批杂文、有1954年上半年由于引进苏联“小品文”带来的杂文的短暂“繁荣”、有1956年《中国青年报》“辣椒”副刊的系列短文，但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杂文创作是相对萧条的。直到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以后，杂文才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次真正“复兴”。以《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为例，从1956年7月1日起，到1957年6月6日止，“花边”内外的大小杂文发表五百篇左右，作者二百余人。篇目之多，作者之众，影响之大，实属空前。从作者上看，包括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建人、夏衍、艾青、臧克家、田汉、何其芳、邓拓、徐懋庸、林淡秋、袁水拍、曾彦修等一大批作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可谓名家云集。从题材上看，可谓国际国内、大

事小事、文学艺术、社会生活、天上地下、山南海北、风土人情、言谈举止无所不谈。从文风上看，清新活泼、潇洒自由、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少有“八股腔”或“新闻体”。然而随着1957年6月反右运动的扩大化，一大批老中青作家被“错划”，杂文短暂的繁荣局面随即销声匿迹。1961年至1962年间，随着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的初步反省，特别是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的提出，杂文创作再次呈现出相对兴旺的局面。但这一次的“繁荣”不像上一次作者面那样宽，其突出特点是多为高级干部写专栏，如北京邓拓的《燕山夜话》，邓攸、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夏衍、孟超、唐弢等人的《长短录》就是这样。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杂文不仅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被彻底消灭，而且许多杂文作家的肉体生命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没有看到新时期的曙光。

二

新中国杂文真正伟大的复兴是新时期以来的

二十年，即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随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等的渐次展开，人们的思想终于冲破多年的禁锢，像潮水一样奔涌而出，杂文创作突破一个又一个思想禁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其声势之浩大、题材之广泛、作者之众多、风格之各异、影响之深远，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可比拟的。就作者而言，一方面，是以巴金、冰心、严秀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杂文家宝刀不老；另一方面，是以邓燕祥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青年杂文家异军突起，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杂文佳作。就创作题材而言，围绕反对封建主义、官僚主义、批判国民劣根性、反对个人崇拜、呼唤民主法治、挖掘“文革”根源、鞭挞丑恶人性、坚决反“左”、反思历史、正视现实、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倡言讲真话、尊重人性和人的尊严、声讨文化专制等等，可谓无所不包。从杂文创作园地而言，新时期以来，几乎所有报刊都开辟了杂文栏目，一些杂文专业报刊也应运而生，杂文专集的出版超

过前十七年不知几十倍、几百倍！为促进杂文创作的繁荣，各种杂文竞赛、杂文评奖经常进行，其中尤以1988年《人民日报》举办的“风华杯”杂文征文和1989年春中国作协首次举办的优秀杂文集评奖活动最为引人注目，成为新时期杂文创作繁荣的重要标志。

然而新时期杂文的繁荣并非一帆风顺，在总体前行姿态不可逆转的大前提下，常有阴风邪火肆虐作怪。围绕“鲁迅式杂文”亦即“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杂文的社会功能问题，杂文界的论争从未停止。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正是这种论争不断深化并取得胜利的结果。熟悉当代杂文史的同志都知道，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所谓“新基调杂文”，其实是50年代以来围绕杂文社会功能一系列论争的逻辑延续，实在是没有多少新意的“老基调”而已。早在50年代初期，黄裳同志就发表了《杂文复兴》的著名文章，对解放后杂文沉寂的局面发出第一声响亮的呼喊。随后，冯雪峰写了《谈谈杂文》的长篇论文，认为“只把鲁迅的杂文或者鲁迅式的杂文才看成杂文”的见解，是“一种偏见和狭隘的心情”。此后夏衍

的《谈小品文》、陈绪宗的《小品文——进行思想斗争的最灵活的武器》、林淡秋的《批评性小品文试谈》等文章，可视为这场论争的策应和延续。这场论争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围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涉及杂文的一段话展开的。毛泽东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在“新基调”论者看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对人民群众中的缺点错误，只能采取“保护、教育”的方式说话，而不允许讽刺挖苦，否则就是“讽刺的乱用”。问题在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封建主义的东西、社会丑恶的东西以及一切与社会发展相背离的东西，并不随着“人民当家作主”而消失殆尽。恰恰相发，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都会适时而生，或卷土重来。“新基调”的虚妄和杂文批判功能的不可或缺，是同样不言而喻的。

新时期杂文取得了突破性的历史进步，这种

进步是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并付出沉重代价的结果。因而，一方面要对这种进步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困难面前看到继续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不宜对这种进步持过分乐观的估计。在杂文蓬勃发展的进程中，还不时遇到“左”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在总体前行的姿态下，还不时出现短暂的迂回、停顿甚至死寂。杂文家虽然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思想解放的时期，但还远未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诚的思想境地，动辄得咎的情况还时有发生。这一方面昭示了思想解放的艰巨性、复杂性、漫长性；同时也充分证明了即使在“艳阳高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杂文依然有其存在的绝对必要性。杂文家任重道远，战斗正未有穷期。

三

五十年杂文走过的曲折道路，给我们以深沉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感悟。

——什么时候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历史和现实的主人，什么时候杂文就呈现出直刺社会丑恶、毫不留情的卓然雄姿；什么时候封建势力、官僚

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疯狂肆虐，什么时候杂文就低靡萎顿，甚至消失殆尽。杂文和杂文家的命运，从来都是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的。诚如严秀所说“国家兴，杂文兴；国家乱，杂文亡”。证之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确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

——杂文是思想解放、社会进步的晴雨表，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外在写照。杂文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比之其他文体具有更加鲜明的战斗性。这种鲜明的战斗性，首先来自于战斗者爱憎分明的立场和对丑恶现象针锋相对的大无畏勇气。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品格，所谓“战斗性”，就没有现实的和心理的坚强依托，是难以在丑类面前拍案而起、怒发冲冠的。

——杂文学需要学养灌注、知识充盈，方能举重若轻、左右逢源。杂文的论理，不是干巴巴地强词夺理，而需要哲学、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多方面知识的培养和磨炼。只有这样，才能动用十八般武艺，致敌于死地。当代杂文史上，一大批优秀的杂文家本身就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如吴晗是著名史学家，夏

衍是著名文学家，邓拓是著名报人。洋溢在他们杂文中的渊博学识，不仅使文章更具雄辩力量，而且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和信息量，给人以智慧的启迪。这是值得今天的杂文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很好学习的。

——杂文需要强烈的文体意识，要讲究杂文特有的美感和艺术性。杂文作为文学艺术大家族中一员，除了具有文学的一般特征以外，还必须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一方面要如何满子所说，注重杂文的论辩性，强调言论的正确性和逻辑的扣杀力。撇开对手的枝节问题，抓住要害，一击致其死命，决不让对手牵着鼻子走，作无谓的消耗性的纠缠。要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对手自以为“精彩”的论点变成对手“窝里斗”的武器，化对手的杀伤力为其自我残杀的力量。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归纳、演绎等多种手段，既从个别到一般，也从一般到个别，通过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剖析，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杂文在注重论辩性性的同时，也可以通过白描手法，像小说那样塑造形象，使读者通过个别形象，窥

见当代世相，起到以小见大的作用，鲁迅的《阿Q正传》、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杂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除了平常论辩文字的一般要求外，还必须机智、俏皮、幽默，善用方言土语和当代生活中的鲜活语言，行文要富有感染力和暗示性，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从而使文章更具杂文味儿和艺术性。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在选编这本杂文集的过程中，力求做到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当二者难以兼顾的时候，我们更加关注杂文的可读性，而相对忽略文献性。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两种考虑：一是已有不少选本从文献方面作了努力，而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我们没有必要再作重复性的工作；二是通过关注杂文的审美价值和文体价值，给研究和写作杂文的同志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更具长远生命力的选本。当然，愿望与现实之间总难免存在差距。这个选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初衷，只能留待读者诸君来评说了。

由于编选时间有限，我们未能就入选文章事